

中国的掌纹 ●

华夏边城

萧春雷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中国的掌纹 ●

华夏边城

萧春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边城 / 萧春雷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9

(中国的掌纹)

ISBN 978-7-5086-6523-8

I. ①华… II. ①萧…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5910号

华夏边城

著 者: 萧春雷

供 图: 萧春雷

策划推广: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7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523-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前言 我们都是城市鉴赏家 001

古城：河西汉唐城市群 011

穹窿银城：寻找象雄故都 049

拉萨：孤独有如皇冠 095

喀什：维吾尔族人的焦虑 131

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 165

长沙：先天下之乐而乐？ 197

厦门：大陆的小女儿 227

后记 我的人文地理写作 245

前言 我们都是城市鉴赏家

城池是定居民族的防御性建筑，游牧民族来去如风，很少建城。2013年元宵期间，我和《华夏地理》编辑易水艰苦跋涉，在河西走廊寻访了四五十座古城。在兰州采访李正宇教授时，他告诉我两个规律：第一，汉人建的城都是方形或长方形，不规则的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建的，比如三角城、椭圆城；第二，古城的大小与等级相关，郡城周长都在1200米以上，县城约1000米，乡城则在400米以内。

河西地区战乱频仍，绿洲无常，荒漠里埋藏着无数遗失名字的城池。荒废在高台县大漠里的骆驼城就是一例。这座周长2000余米的长方形大城，论规模超过了张掖、敦煌等郡城，绝非无名之辈。但它到底是古代的哪座城池呢？好几代人为之伤神，最终，现代考古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城外的墓葬证实，骆驼城先后曾为汉表氏（是）县城、前凉建康郡城、北凉沮渠蒙逊政权的都城、唐建康军城，唐末从史籍中失踪，被风沙埋没了一千年。

汉唐经营西域，在河西留下了上百座各种类型的城池，最有意思的

是，这些城市沿走廊一字排开，像铁链一样高效组织起来，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坚强通道。事实上，它们组成了丝绸之路上一个个驿站。安史之乱后，少数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中原王朝被迫另开海上丝绸之路。中西阻隔，驼队断绝，灿若珠宝的河西城市群尽数没落。多少彪炳青史的伟业，沦为沙漠里一座座可疑的荒城。

我关注的城市，多数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城市，或者边陲城市。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独一无二的京师、首都、中央之城，这些天高皇帝远的边城自由散漫，个性鲜明，在中国的城市体系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自发明了农业之后，人类开始聚集定居，较大一些的聚落形成了城市，但城市之间，差异极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率先进行了城市类型学研究。他说，欧洲古代城市如雅典、罗马，实际上是军事中心；中国的城市则是政治和行政中心；只有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城市，才开始形成经济中心，并发育出市民社会，成为现代城市的先驱。

在韦伯的眼里，中国古代那些壮丽和繁华的城市，不论是长安、北京、南京、杭州，根本就不叫城市，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他曾经为资本主义城市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城市是一个共同体，聚落至少得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而且还得有下列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及法律（至少部分是自己制定的）；（4）具有团体的性质；（5）至少部分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通过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其中，自己的法律、市民团体、部分自治，都是

中国城市闻所未闻的。

那么，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什么呢？《周礼》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大意是：只有君王可以建立国家，辨正空间方位，以国家体制经营四方，按不同职能设置官位，让民众接受管治。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完全体现了这一礼制原则，将国家官僚体制空间化。

你可以通过城市体系来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传统的城市，几乎均为各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并依据行政级别，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系统。金字塔的顶端是京师，那里有巍峨的宫殿和孤独的皇帝；第二级是各省治所，也就是省会城市；第三级是各府治所，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第四级是各县治所，为最低级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群是高度政治化的，俨如官场，城市的等级与城市首长的行政级别完全一致。

被选中为京师的城市就是这个中央之国的中央之城。没有哪个城市注定成为京师。皇帝在哪里，京师就在哪里，京师一定最大。“天子实十二里之城，诸侯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周朝天子所居之城，城墙每边长12里，其他城市则按官爵等级递减，只能建城墙每边长9里、7里、5里的小城。逾越分寸，就是犯上作乱、准备造反了。

首都是以皇宫为核心建立的政治城市，各个次级政治中心——省城，则围绕着省级官署建筑群而建，县城围绕着县级官署而建。中国的每座行政城市都是相似的，都是一个小小的皇城。

古代中国留下的遗产，许多已经损坏，但高度政治性的城市体系完好如初。我们看如今的中国城市，依然按照首都、直辖市和省城、地市

级城市、县市级城市这样的等级序列排列——前些年又增加了副省级城市。中国大地上的城市体系，首先是一个个不同级别的政治中心，是国家行政体系的空间布局，工商业是次要的。按韦伯的定义，它们依然是古代城市。

青藏高原上的城市与内地截然不同。许多人误以为拉萨的中心是布达拉宫——王权的象征，其实拉萨的真正中心是大昭寺里的那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围绕着佛像，仿佛涟漪，荡漾出三圈越来越大的同心圆转经道——囊廓、八廓和林廓，建立起拉萨的神圣空间，同时也是城市空间。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城市崇拜权力，以皇宫、官署为中心，近代城市崇拜财富，以港市、金融中心和CBD（商务中心区）为中心，那么，拉萨则是一座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城市。我觉得，拉萨不但是地理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高原城市，丰富了中国城市类型。

青藏高原上的第一座城市，应该是阿里地区的穹窿银城——神秘的象雄王国国都。象雄是本教发源地，七世纪时被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摧毁。有人认为穹窿银城遗址在札达县的曲龙村，有人认为在噶尔县古如江寺的卡尔东。如果你相信前者，穹窿银城就是秘藏于土林窑洞里（札达窑洞比陕北窑洞简陋得多）的一座都城。但我倾向于认同后者，穹窿银城是一座矗立在高台上的城市，三面悬崖绝壁，与本教神山冈仁波齐峰遥遥相望。

无论如何，这座矗立于喜马拉雅之巅的穹窿银城，位于印度、中亚和中国三大古文明交会处，像神话一样光辉和壮丽的穹窿银城，已经荡

为废墟。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城市，因为深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和境外文化的影响，往往独具一格，洋溢着异域风情。我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维吾尔族聚居地，是一座为适应干旱气候条件而建造的城市，明显属于中亚城市谱系，与阿富汗的喀布尔、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相似。

生土建造的喀什老城，街巷狭窄曲折，宛如迷宫。乾隆年间的《回疆志》描述说：“喀什噶尔旧有土城一座，不圆不方，周围三里七分余。”这是一座自然生长的有机城市，无中心，非对称，由无数个围绕着小清真寺的社区组成，但所有的道路都通往艾提尕清真寺。有意思的是，作为喀什最大的信仰中心，艾提尕清真寺并非老城地理中心，两百年前，它甚至在老城之外。

如果说中原的城市讲究辨正方位，强调中心、对称和中轴线，试图营造一个对应皇权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那么，拉萨与喀什这两座边城却大异其趣，信仰至高无上，城市结构亦因此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或长江下游，长期受到忽视的内陆城市重庆、长沙，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边城。

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重要性，但地理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有时，一座城市得耐心等候自己的时代。在农业社会，缺乏耕地的重庆山城平平淡淡，淹没在全中国成百上千座普通府城之中。作为长江上游水运中心，重庆的地理优势体现在交通和军事方面，它的机遇是商贸或战争。

1891年通商开埠，重庆迅速超过成都，成为西南地区商业重镇；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的“三线”建设，又让重庆超越武汉，转型为一座重工业城市；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工程，则把重庆推上中国第四座直辖市的宝座。

坐在渝中半岛的朝天门码头，凝视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我感到微微的晕眩。1927年，重庆的正式人口统计只有20.8万人；如今，主城区人口已经超过了千万。对重庆而言，过去的两千年仿佛只是一出冗长的序曲，为近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和脱胎换骨做足了铺垫。重庆转身之快，让人猝不及防，许多人还沉湎于江湖码头、袍哥往事时，它已经变成了现代工商业大都市。

这可以解释重庆人性格中的矛盾。国人公认，重庆人豪爽、忠勇、尚义、火爆、冲动、耐劳、草根，然而前两年重庆市评出的十大本籍历史名人——巴蔓子、赵智凤、秦良玉、邹容、赵世炎、刘伯承、聂荣臻、卢作孚、邱少云、杨尚昆，其中只有巴蔓子和邹容两人比较像典型的重庆人。我想，所谓的重庆性格或许只是这座城市在商贸时代留下的码头文化遗产，农业时代的重庆并非如此，工业时代的重庆亦非如此。我们仍然沿袭着过去对它的印象，事实上，如今的重庆人充满政治热情，再也不是当年那些袍哥了。

时事变迁，城市的性格随之演变。自古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谁知到了后世，竟有“吴下民风柔弱”的说法。清中叶以前，湖南只是寻常的内陆省份，在偏僻的山村，一代代湖湘学者传授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却从无实践的机会。自广西太平天国起义军过境湖南，仿佛打开了历史暗藏的某个闸门，湘籍子弟倾巢而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

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毛泽东、刘少奇，随便列举一些名字，都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过闪亮的光芒。

在国人的记忆里，崛起于近现代的长沙，是一座忧国忧民、勇担道义、充满血性的城市。1995年，有10万长沙市民走上街头投票，选出的长沙精神还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后长沙以洗脚店、酒吧、演艺吧闻名全国，湖南卫视以娱乐综艺节目崛起，长沙市政府宣布打造中国娱乐之都，长沙多次入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长沙人不再“心忧天下”，而是“先天下之乐而乐”了。新旧长沙，城市形象大相径庭。

我觉得，城市没有固定的本质，如同人类一样，它在不同时期显露不同的面目。长沙人位居边鄙，但被湖湘学风培养得心高气傲，一心要出人头地。如今既然不需要他们流血救国了，他们只好将旺盛的精力转移到“声色犬马”上。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必须做得最好，站在时代的潮头。老话说：性格决定命运。

远离京师的东南沿海，发育出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传统。明末清初，郑氏家族（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祖孙三代）掌控的海上武装力量达到鼎盛，立足厦门、金门，对抗清政府、荷兰两大国家力量。1661年，郑成功率领闽南子弟兵渡海东征，赶走荷兰人。此后，大量闽南人以厦门为口岸，过台湾、下南洋，把中华文化散播到东南亚地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后来又开放了天津、大连、武汉等更多沿海沿江口岸。作为全球贸易的一环，这些城市迅速变成各地的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古老中华诞生了第一批近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近代城市并非政治中心和军事

中心，它们多位居边地，因港而兴，城市空间围绕着港口码头而展开。因为最具现代性，这些口岸城市最有活力，成为近代中国的明星。

厦门是我最熟悉的城市，犹如描述一个亲人，我不想陷入考据与细节，而是直抒己见，谈论地理环境和通商开埠对这座岛城精神气质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最恢宏的造物，深受山川地理、行政建制、国家政策、人口族群、区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偏处一隅的边陲城市，扎根于当地奇异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之中，感受异族文明的强烈冲击，往往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但边城——那些远离父母关爱的孩子，身世沧桑，性格倔强，最让人动情。

有无数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如见闻录、游记、画册、杂感、回忆录、特写、论文、城市史、专题调查、新闻报道等等，我选择了最困难的一种：全景式叙述。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应《华夏地理》杂志“读城”专栏之约而写的，责任编辑易水十分认真，要求我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里正面讲述一座城市的来龙去脉、独特命运和精神气质。采访和写作过程十分艰辛，但深入了解了这些城市的隐秘之后，便有魂梦相通的感觉，与之变成了亲密的友人。喀什、拉萨等地的每一则新闻，从此都让我揪心。

象雄故都，河西诸城，内陆、边疆和海防城市，收入本书的七篇文章是精心选编出来的，构成一个小小的跨时空群落，从各个角度呈现中华边城的多样性。

从前，我们以一个城市为家，只认识有限的几座邻城。而在全球

化的今天，我们旅行，飞机和高铁每日行经许多城市；我们阅读新闻，每天过眼全球无数城市的信息。无意之中，我们都成了城市鉴赏家。茫茫城海，谁曰无情？每个鉴赏家都有心中挚爱，或许这些感动过我的城市，也让你魂牵梦萦。

2015年6月29日

古城：河西汉唐城市群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每座古城，穿越历史的风沙抵达我们，都讲述了某种文明经历的生死劫难。河西走廊是我国古城遗址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农牧民族两千多年的争战、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兴替、绿洲和沙漠的无常变迁，都记载在古城盛衰的故事里。

游牧民族的城

农耕民族善于种植，他们种植在大地上的最大物体就是城池。游牧民族很少建城，他们逐水草而生，到处漫游。但河西走廊最古老的城堡的确是游牧部落建造的，距今2500年以前——那时候，华夏族还没有进入河西呢。

“三角城遗址属于沙井文化，大量使用青铜器，是史前文化的最后一期。1924年被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最早发现。”甘肃金昌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李勇杰介绍说。我们来看的三角城，就是河西城池之母，很可

能是月氏人留下的。远古之事难考，按照《史记》记述，乌孙人和月氏人最早在河西放牧，接着月氏人把乌孙人赶跑，独占河西走廊。三角城的主人非此即彼，多数学者倾向于月氏。

遗址坐落于双湾镇三角城村（原名尚家沟）的田野，一道残墙围成不大规整的一圈，西北部向外凸出，有点像三角形，边长各百余米，只开一道南门。中国人讲究方位，通常会把城堡筑成四边形，很少建出这种方不方、圆不圆的土围子。城墙是泥巴垒砌起来的，已变成一道低矮的土墩，墙根堆满淤土，城心低洼，整个城址仿佛一口浅底锅。这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城堡。

村里人很为这座城址自豪，还办了个展览馆，以图片为主。一张铁犁铧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月氏人种地吗？”

“沙井文化以畜牧业为主，也有少量农业，半定居，所以有房屋与城堡聚落。”李勇杰说，“其实，河西的史前文化都有农业的成分。绣花庙以西的四坝文化，要更早几百年，属于另一个类型的青铜文化，也发现了麦粒、磨盘和农业生产工具。”

我一直以为北方草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他们没有农业，原来大错特错！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内蒙古高原，主要是农耕文化；直到三四千年前（差不多四坝文化时期），草原居民才扔掉农具，转向畜牧业，变成“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到了秦汉时期，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耕种，北部的蒙古高原和西部的青藏高原则变成来去如风的无数游牧部落的牧场。位于两大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非但不是障碍，反而因为气候适宜、水草丰美而成为各方争夺的战场。

我们把时间定格在西汉初年。这时，刘邦在长安建立起汉朝，匈奴



金昌市三角城遗址，河西诸城之母。考古学家认为是2500年前月氏人建造的聚落城堡